

高教信息参考

2020 年第 1 期（总第五期）

济宁医学院发展规划处

2020 年 4 月 3 日

目 录

前沿信息

教育部科技部印发意见要求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教育部公布新一批本科专业新增 1853 个撤销 367 个

山东省“重点工作攻坚年”动员大会召开

邓云锋：奋力谱写教育攻坚新篇章

高教视点

国家治理背景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本质与策略

大学论坛

为高校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破“SCI 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教育部科技部印发意见 要求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破除论文“SCI至上”提出明确要求。《意见》强调，要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积极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提出各自评价的侧重点，明确论文在其中的不同权重；完善学术同行评价，引导评审专家不简单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代替专业判断，负责任地提供专业评议意见，并倡导建立评审专家评价信誉制度；规范评价评审工作，大力减少评估评审事项，评价指标和办法要充分听取意见，实行代表作评价，并遵循同行评价原则。《意见》要求，要规范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改进学科和学校评估，在评估中要突出创新质量和贡献，审慎选用量化指标。优化职称（职务）评聘办法，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职称（职务）评聘的直接依据，以及作为人员聘用的前置条件。扭转考核奖励功利化倾向，学校不宜设置对院系和个人的论文指标要求，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科学设置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学校不宜将发表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生毕业和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树立正确政策导向，不采信、不发布以SCI论文相关指标为核心编制的排行榜等信息。

（来源：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公布新一批本科专业

新增 1853 个撤销 367 个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结果显示，各高校新增备案专业 1672 个、审批专业 181 个（含 130 个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 51 个目录外新专业），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 47 个，撤销专业 367 个。同时，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基础上，增补了近年来批准增设的目录外新专业，形成了最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年版）》。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认真做好新设专业的建设工作，坚持需求导向、标准导向、特色导向，把按社会需求办专业作为专业设置和调整的前提条件，把落实国家标准作为专业建设的底线要求。要根据社会需求变化情况，动态调整招生规模，持续改进和提升专业内涵。要健全质量保障，加强对新设专业的检查，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据介绍，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教育部组织开展了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经申报、公示、审核等程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评议结果，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确定了同意设置的备案专业、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新增目录外专业点名单。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 年 3 月 4 日 作者：焦以璇）

山东省“重点工作攻坚年”动员大会召开

3月17日上午，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重点工作攻坚年”动员大会。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动员全省锐意改革开放、奋力攻坚克难，确保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省委书记刘家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主持，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出席。

刘家义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全省“重点工作攻坚年”，实质上就是“改革攻坚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经过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我省同全国一样，呈现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但目前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防控这根弦始终不能松，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干净彻底驱毒魔。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刘家义强调，再大的风雪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再大的困难改变不了山东高质量发展的征程，再大的压力动摇不了我们深化改革开放的坚

定决心。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亿万齐鲁儿女牢记总书记“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殷殷嘱托，步步深入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从2017年深入调查研究、确立战略构想，到2018年全面谋篇布局、持续有序推进，再到2019年强化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实，八大发展战略齐头并进，山东呈现趋势性、关键性深刻变化，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务实高效的政务生态、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生态、富有活力的创新创业生态、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刘家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要求山东在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上“奋力趟出一条路子来”。当前，我们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机制束缚，破难攻坚最硬核的举措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在深化落实已出台各项改革开放举措的基础上，咬定目标不放松，风雨无阻勇攀登，一切围绕高质量发展、一切服务高质量发展，头拱地、往前冲，迅速发起九大改革攻坚行动。

一要发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改革攻坚行动。针对抗击疫情“大考”中暴露的问题，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公共卫生现代化信息系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公共卫生人才队伍等方面的短板，着力构建平战结合、科学高效、功能完善的公共卫生和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整体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和水平。

二要发起流程再造攻坚行动。要以更大力度简政放权、流程再造，让“跑一次”为上限、“不用跑”为常态，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办事

不求人。要落实“放权、精简、集成、共享”的总要求，放权要更彻底，做到“应放尽放、放无可放”；手续要更精简，今年，办事环节、提交材料、办理时限要分别再减少一半；政策要更集成，凡“一件事”涉及多部门的实行并联审批，部门之间政策要协同，凡部门内部涉及多个机构的事项，也要并联办理、一次办好；数据要更开放，各类数据一律依法向社会开放，实现“一个平台一个号、一张网络一朵云”。要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阻碍改革的“钉子户”要坚决拔掉，妨碍改革的“绊脚石”要坚决搬掉，延误改革的“顶门杠”要坚决扔掉。

三要发起人才制度改革攻坚行动。将“人才兴鲁”战略变为具体行动，构建全类别、全方位、全周期的高效制度体系，聚焦聚力打造人才高地。要让人才发展有舞台，将人才与产业紧密融合，怎么有利于成就人才就怎么办；让人才创业有保障，出台人才发展促进条例，组建“山东人才发展集团”，提供全链条、全要素人才创业支持；让人才价值有回报，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让作出贡献的人才“名利双收”；让人才服务有温度，扩大“山东惠才卡”服务范围，建立来鲁人才对接服务专员制度，领导干部要当好人才“后勤服务员”。

四要发起科教改革攻坚行动。要坚定跻身创新型省份前列目标，让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创新“策源地”。该改的坚决改，全面推行科技攻关“揭榜制”，同步推行首席专家“组阁制”、项目经费“包干制”，“改”出科技攻关新动力。该放的坚决放，加快高校科研院所“去行政化”，创新学术评价制度，“放”出教学科研新活力。该融的坚决融，坚持产学研用一体化，推动科教、产教、校地加快融合，“融”出产学研新合力。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能工巧匠。

五要发起财税金融改革攻坚行动。要加快财税金融领域基础性改革，撬动更多资本支撑八大发展战略，实现市场主体活力、财政“三保”能力、政策引导能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能力明显增强，银行不良贷款率、政府综合债务率大幅下降。财政资金整合要做“加法”，变“雨露均沾”为“精准灌溉”；企业税费负担要做“减法”，全面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保持民生支出只增不减；政府基金债券要做“乘法”，推行“基金+项目”模式，用足用好中央专项债券政策；化解金融风险要做“除法”，坚守底线，强化责任，携手打好攻坚战。要大力推进地方金融改革，全力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六要发起资源环境领域改革攻坚行动。要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重点推进“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改革、“标准地”供给改革、“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全面完成各项节能减排降碳约束性指标。加快构建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的体制机制，推动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七要发起企业改革攻坚行动。加快培育强企方阵和支柱型产业集群，立起制造业强省的“四梁八柱”。要以更大力度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一盘棋”优化国资国企布局，“一企一策”抓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一把手”扛起改革责任。要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健全促进民企转型升级机制，健全政策出台和调整综合影响评估机制，健全创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

八要发起开放倒逼改革攻坚行动。要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自贸试验区、上合示范区要当好“先遣队”，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发挥探路先行作用；市县要当好“主力军”，办好重大活动，搭好合作桥梁，抢滩开放前沿；开发区要当好“特战队”，全面推开各项改革任务，打造“双招双引”高位平台；企业要当好“排头兵”，成为对外开放主阵地。

九要发起优化法治环境攻坚行动。要坚持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建立与之相应的落实机制，擦亮法治山东“金招牌”。要健全“接诉即办”机制、“免罚清单”机制、“法律服务代理”机制、“限时清欠”机制。要像爱惜眼睛一样，珍视山东人诚实守信的好口碑，让诚信者一路绿灯，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刘家义强调，攻城不怕坚，攻坚莫畏难。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列出攻坚清单，重点任务立“军令状”。主要领导干部要有战斗意志和决胜勇气，带头啃最硬的“骨头”。各级干部都要做改革的“实干家”“促进派”，共同营造改革的大气场。要旗帜鲜明选拔重用改革者，大张旗鼓褒奖激励改革者，理直气壮支持保护改革者，对耽误、阻挠、迟滞改革的，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负责就问责、不担当就挪位、不作为就撤职。

刘家义指出，攻坚如同登山攀岩，真正的攀登者绝不会因留恋半山风光而停步，也不会因前路艰险而畏缩。我们要有踏平坎坷成大道的豪迈，有风雨过后见彩虹的信念。山东高质量发展“春山在望”，攀登上去就能领略无限风光。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做“攀登者”、当“挑山工”，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龚正在主持时指出，要发扬抗击疫情过程中形成的排除万难、夺取胜利的战斗精神，保持“头拱地、向前冲”的奋斗姿态，坚决冲破制度藩篱，冲过新旧动能转换最艰难的阶段，冲进高质量发展新的春天。要咬定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全力做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抓项目建设，抢抓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时机，抢抓春季施工黄金季节，强化用工、供地和资金保障，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双招双引”重点签约项目、补短板强弱项重大项目、重点技改项目等快建设、早见效。要加强政策集成创新，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市场主体，推出各类“政策包”，主动送上门，提高政策通达率，让黄金政策真正成为帮助企业群众纾困的“及时雨”。要强化统筹协调，强化责任担当，把疫情防控与改革攻坚、精准扶贫、保障民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社会稳定一体推进、一体落实，争取最佳的综合效益，确保新旧动能转换初见成效，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会议采取视频形式，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部分中央驻鲁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驻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县乡设分会场。

（来源：齐鲁网·闪电新闻 记者：李侠 陈洋 王玉栋）

邓云锋：奋力谱写教育攻坚新篇章

省委、省政府对今年重点工作攻坚作出全面动员部署。全省教育系统必须拿出啃“硬骨头”、趟“地雷阵”的勇气和决心，坚决破除境界视野不够开阔、办学特色不突出、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契合的障碍和瓶颈，做好改革、开放、创新三篇文章，为全省重点工作攻坚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以改革激发动力。加大教育综合改革力度。加快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积极推动普通本科向应用本科转型；以“筑高峰、冲一流、强特色”为引领，举全省、全系统之力支持重点大学和高峰学科建设；推进预算拨款制度改革和绩效工资分配改革，引导高校向质量提升要效益；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推动“有学上”向“上好学”的加速转变；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打赢教育评价改革“龙头之战”和新高考改革“滩头之战”；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科技，推进学科融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以开放释放活力。加大国际合作交流力度，抓住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省政府与教育部签订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的机会，积极开展与日韩、欧美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秉承“教育+”理念，深入实施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地融合，加快推进高校与科研院所整合，支持校企合作办学，鼓励校地共建科创

园区，推动学校扎根、服务当地，共融共生、共同发展。

以创新提升效力。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理念，扭住“人才培养”这个教育基本职责，增加硕士、博士授权点，实施卓越人才、“齐鲁工匠”“齐鲁名师”“齐鲁教育家”培养计划，打造山东人才“蓄水池”，画出最大同心圆。实施教育流程再造，推进教育政务服务优质创新工程，打造“教育服务、叫您满意”品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来源：山东省教育厅网站）

国家治理背景下 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本质与策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逐步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在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中，大学治理现代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完善大学治理结构体系、推进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一、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尽管“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由“governance”译来，但是大学治理作为实践事实则是随大学产生而产生，可以说，大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治理史。“治理对于大学而言是内生的，而非外加的”，“治理”是“大学的一种内生品质”，因为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学术探索的社会组织，内在地要求大学必须是自治的状态，教师群体必须拥有充足学术自由，否则大学便不成其为大学，此为大学产生和存在的内在逻辑。

不论是中国最早的稷下学宫，还是西方最早的波伦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它们的产生皆源自人们对真理、知识、思想的自由追求与探究，这种自由追求与探索的状态从根本上赋予了大学本身最为厚重的文化色调和历史传统，这便是大学自治。

如果说追求真理与知识探索是大学的本质，那么追求自治便是大学治理的本质，缺乏自治的大学算不上是真正的大学。张诗亚教授在论及大学的起源与文明史时认为大学存在四种作为历史传统的基因构成，“一是为全球大学开创了大学办学模式；二是对逻格斯之探索，追求、证明、引领了人类对知识领域的不倦探索，极大地促进了理性思维及其伴生的科学发展；三是奠定了自拉丁文发轫的学术传播、交流传统；四是为学术共同体之自由、自治、自尊”。可见治理本身便是大学的基因所在，大学产生、存在、演变与发展的过程正是一种大学治理发展的过程，“从大学发展史来看，大学一贯强调自治，反对外部干预，这说明大学一贯崇尚治理而反对外部控制”，“没有自治，大学就不存在……，大学天生就具有自治的诉求”。因此，当下大学治理现代化并非是由外至内的强加，而是新时代中国大学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诉求。

中国大学发展长期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大学内部主体自由精神欠缺，大学内部治理能力弱，作为自治的治理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这极大地限制了大学的学术创造、科学研究及新时代高素质人才培养；二是我国大学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质量诉求、现代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要求，特别是仍然不能真正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需求。这两个问题相互掣肘，制约着我国大学本质功能的发挥及其在世界大学丛林中的地位。因此，21世纪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政府到大学都在积极探索大学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它的本质要义在于试图焕发大学治理基因的现代生命活力，回归大学本质和大学发展的内部逻辑：学术自由、知识创造、真理探索及其充分自治的状态，这种自治状态正是一种培育具有自由、民主和创新精神的现代公民的大学教育实践。自治并非是指单一大学内部主体的自我治理，而是大学利益与权利相关者的共同治理，主体结构为政府、大学和社会，这充分反映了大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本现实性。历史已普遍证明，脱离政府的大学是难以维系的，政府力量无疑是大学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大学都不能脱离社会，社会乃是大学的动力之源、生命之根和价值之向。现代大学治理理念反对大学的自我封闭、孤立和自大，它内在地要求大学必须走向开放、包容和多方联合，构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的大学治理共同体。

大学治理现代化在内部结构上包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强调一种以大学“善治”为目标，以彰显大学精神、激发学术活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导向，以民主参与、协商共治为理念，以制度体系为保障的大学秩序体系。“善治”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大学处于最佳状态，是一切相关利益主体对大学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所谓“最佳状态”，是说各利益主体总是在一种动态平衡之中，意味着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或矛盾总是得到有效调解并转化为大学发展的持续推动力；意味着各类资源保持配置合理、高度整合与充分利用进而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大学发展动能的运动状态；意味着校长、教师和学生共同治校的体制机制的高效性、稳定性和持续进步性。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大学治理多元主体及其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大学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艺术、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充分体现新时代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现代诉求，构建自由、民主、法治、和谐的

大学治理模式，彰显不同主体平等的利益、权利、尊严与能力，形成大学治理过程与结果、手段与目的的辩证统一，推进中国大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释放应有的力量。

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得益彰、互为动力，共同构建出一个包含价值体系、制度体系、行动体系和结构体系的完整治理体系。价值体系强调大学理念和治理理念的现代化，特别突出大学学术创新价值和人才培养价值、国家贡献功能和社会引领功能；制度体系注重多元治理主体及其协同性，治理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治理方式的法治化、自由化、民主化和和谐化；行动体系分为议事决策、监督问责和保障救济，使得大学实践更加科学、高效和法治；结构体系包含权利行使、分权制约和权利保障，这是大学治理的基本前提。

二、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表征

从历史事实和理想目标上看，大学治理现代化存在多方面的重要表征，集中反映为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手段、过程与目的。

一是体制机制先进。所谓“先进”，核心在于这样的体制机制能够体现大学发展的本质规律，最大化地激活一切大学力量，充分地解放大学“生产力”，表现为大学内部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的破除，各级各类行政部门始终首先立足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服务，做到责权统一、效率最优化。从外部来看，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体现为：政府管理与放权的矛盾、权力与利益如何分而治之的关系、地方政府与大学的权力关系在相应的机制下得到合理平衡，最终服务于大学“生产力”建设。不论在何种意义上，是否实现“善治”和提升大学治理效能是大学治理体制机制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志。

二是人才培养卓越。一个大学治理得如何，要看大学是否在各个学

科领域和社会分工体系中培养出了为民族、国家与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才队伍。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培养新时代中国高素质人才队伍，打造人才强国，实现教育强国战略。高等教育必须充分同社会分工、经济转型和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为社会改革与发展培养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在面对社会变迁与挑战时，他们的应对能力、领导能力和创造力也显得游刃有余。

三是科学研究丰硕。毋庸置疑，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乃是大学的天职与合法性证明，现代大学治理的好坏必然要以科学研究、学术创新为判断标准。事实上，大学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之一正是科学研究的发展，它的前提条件是学术自由、先进的体制机制和优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的丰硕性不仅表现在成果本身的理论性和真理性，关键在于，“大学还需要探索科研成果的社会意义，并就这些成果如何转化成为政策和付诸实践提出建议”。

四是文化价值凸显。首先，大学应有的社会与文化批判精神、知识创造精神、历史超越精神和社会领导精神，是大学文化价值的突出表征，大学的核心文化内涵，大学内部共同体共建共享的价值观，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最重要文化标识。其次，大学应有的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功能定位，作为大学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充分体现为大学文化价值的历史绵延性、多主体认同感、文化价值辐射力和文化价值正向性。这就意味着大学治理现代化应遵循一种文化的逻辑，注重大学文化价值的建构，凸显大学文化价值的独特地位。

五是社会服务强劲。表现为现代大学与其所在社会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共生样态。一方面，大学必须扎根社会，于社会中吸纳自我生存与发展的力量；另一方面，大学必须为社会提供动能——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和文化价值辐射。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在于大学不再局限于围墙之内，它必然与所在城市、政府之间构建起积极的互动框架，进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自然生态、人才结构等方面形成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

三、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策略

实现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需要借助以下一系列的策略或条件支持。

发挥制度优势。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必然以“中国特色”为前提,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是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性策略。基于这样的制度优势与不断创新,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才能保持和稳固自身的根本价值方向,才会产生源源不断、深厚博大的动力源泉。现代大学治理的内核是大学自治,自治并非脱离了制度优势的自治,否则便如无源之水。

把握新时代特征。大学治理现代化是方法、理念与目标的现代化,因此它还需面向新时代,全面、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办立足于新时代、为新时代服务和充满新时代气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

支持国家需要。大学治理现代化内含积极的国家认同与国家价值维度,国家是大学治理的根本依托,又是大学治理的核心目标;支持国家发展的科技与人才之需是大学存在的内在合法性,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要义,也是实现大学治理效能的根本路径。

坚持立德树人。国家的人才之需,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爱国人才之需,这样的人才首先要具有高度的国家认同与爱国情怀以及优良的社会道德品质,因此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便是坚持立德树人。做不到立德树人,所谓大学治理现代化便是空谈,大学治理主体须是有德之人,大学治理过程须是道德实践、政治实践与科学实践的统一。

突破思维局限。治理思维不同于管理思维,大学治理现代化必须突

破固有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僵化、霸权、强权、控制等思维局限，突出思维的批判性、创新性、超越性、共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实现思维的突破与转变是大学治理的内在过程，也是实现大学治理过程与目标的前提条件。

创新制度耦合。大学治理现代化在于破除大学体制僵化、行政权力控制过严的制度痼疾，有效策略是创新制度耦合，推进三角权力模型的科学定位，即政治、行政、学术权力的良性互动，其关键是对大学教师权力的尊重与解放。

建构人才高地。大学治理现代化以高素质人才培养为目标，同时也以此为过程依托，缺乏以高素质人才队伍为主体支持的大学治理注定是低效能和低品质的。因此，现代大学治理应以构建人才高地，聚集学术人才、管理人才与教学人才，以及建设丰富多元的高端科研创新平台与人才培养平台为基础。

提升国际品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面向世界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大学发展的迫切议题。提升国际品质既是我国大学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策略。

系统变革教学。教学水平与新时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效能的实现密切关联，传统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显然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乃至未来大学发展的要求，进行系统性的教学变革无疑是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核心策略。以教学变革为支撑的现代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之维，也是实现现代大学整体重塑的关键路径。

优化资源配置。国家整体观照下的优化资源配置是中国大学治理水平获得整体提升的经济前提，总体上须实现中东西部的资源分配正义，

推进区域之间优质资源的合理流动，特别要充分考虑西部大学和地方大学经济基础薄弱的现实情况。就大学内部而言，资源优化配置的首要着力点在于扩大高校资源和财政的自主使用权，其次是实现校内资源的分层分类设计与配置，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

塑造大学文明。文化软实力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隐形力量，大学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大学文明。塑造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体系的现代大学文明是实现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它反映为师生共同信守、尊奉和践行的一种共同价值追求。

树立学科统领。学科是大学的综合要素，缺乏完善、前沿和富有特色的学科体系的现代大学治理同样是不现实的。现代大学治理必须以学科为统领，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因校制宜，打造学科优势与特色。

培聚社会资本。任何时代的大学治理都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历史证明，成功的大学治理与发展不仅仅依靠政府财政，还在于这些大学懂得如何培聚社会资本，主要方法便是形成大学与社会其他系统的积极互动，进而形成共生。核心机制是大学通过积极服务社会，将自身的人才优势、智库优势和科技优势充分转化为文化与经济资本优势。

借力科学评估。评估无疑是大学治理与发展的重要参照。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需要立足中国大地呈现其必然的差异性、多元性和层次性，这需借力于科学的评估标准与体系，“科学”强调的是评价本身的辩证性、认同性和引领性。

（来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有删减
作者：孙杰远 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育学部部长）

为高校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日前发布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对于破除“SCI 至上”和“过度追求 SCI 论文相关指标”、进一步破除“五唯”等不良导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将促进高校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提升高校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未来，在科研成果评价方面，应当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多种表现形式和对应的不同评价标准建设。对于基础研究类，成果可以体现为一篇或者系列的高质量论文、一本或者多部学术专著等形式；评价过程不应仅仅考核 SCI 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和引用率，而应全面考察成果的原创性、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力。

同时，在人才评价方面，推行代表作制度和分类评价体系。基础研究类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应改变原有的以刊物影响因子、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等简单统计方法，调整为列举代表作、陈述原创性、注重同行评价等新方法，重点评价成果的知识创新质量和学术贡献水平，不把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引导科研人员和广大教师潜心科研、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长期致力于原创性的、高质量的、真正属于本领域的前沿科学研究。

对于应用类科研人员，则主要采用由市场、用户和企业为主的第三

方评价方式，评价重点是解决生产实践关键技术问题的实际贡献，以及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的实际效果，不以论文作为单一评价依据，强调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技术转移推广、科学普及等科技成果实际产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提高科技评价的社会开放程度和工作效率。

总之，高等学校应针对实际，修正和建立新的成果评价、学科评估、人才评价、“双一流”建设、职称晋升、人才培养等评价体系和规章制度，让科学研究回归本原、回归创新，让科研人员潜心科研、致力创新，将高校科学研究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来源：《人民日报》2020年03月19日 作者：孙友宏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

破“SCI至上”，科研评估如何改进

一、如何树立正确的科研评价导向

近年来，大学在知识创新和转移方面的功能被矮化成细小的量化指标，科研活动被各种评估体系所掣肘，SCI变成横行大学和科研的指挥棒，学术生态被改写，大学的真正使命受到极大挑战。（详见拙作《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使大学深处危机》，载《光明日报》2016年8月23日第13版）。近日，教育部和科技部共同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时主导纠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赞同。

《意见》提出，破除论文“SCI至上”，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树立正确的科研评价导向，此中，有5个原则需要遵循。

囿于评估本身的局限，没有一项体系或模式可以对评估对象进行完美的评估。科研评估也不例外。换句话说，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预载并匹配评估目的，否则科研评估的信度和效度都将无从谈起。如何确立清晰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具有可行性的评估目的，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必须首要树立的科研评估原则。

跟随评估目的而来的，是评估目的预载及体系匹配的复杂性。政府部门的评估，其目的应该更多体现在监管和促进国家宏观科研目标与任务的达成，并勇于承担公共问责。对于各大学而言，其评估目的则完全

不同，要侧重于科研过程和产出，以促进院校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贡献为首要功能。评估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个不同主体的评估体系或模式，必须是有差别同时有协同关联的。此外，即便考虑到目的的正确预载和方案的合理匹配，作为公共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科研评估还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如体制框架、学科领域、院校特点、持份者、时空差乃至国际政治等等，进一步增加了其复杂性。

再次，正如绩效评估的天然局限一样，科研评估虽然是科研事业发展的必要环节，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过分强调它的功能，而应该注意其应用的合理性与適切性，避免评估在科研和高教发展中的过于强势，导致评估主义的泛滥。日本的科研审计文化、台湾的 SSCI 综合症、香港的科研绩效主义都受到社会各界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批评，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负面典型和前车之鉴。

科研评估的目的性、复杂性和合理性，决定了科研评估的第四个原则——创建和采用各类科研评估体系的慎重性。在采用某一种评估体系或模式之前，对它的背景、原理、適切度、正负面效应都应该作全面、科学和文化的综合了解，而不是仅仅限于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肤浅理解，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借鉴而来的国际经验（包括 SCI 论文指标体系），这点尤为重要，而文化理解就显得十分关键。吃透其原理、精神及背后的复杂背景，才不至于盲目模仿、食洋不化。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而是拿出勇气、敞开胸怀、面向世界，强化和海外华人学者的深度合作。

任何一个科研评估体系或模式的成功应用，都离不开小范围、小类别的预运行。在获得充分的反馈之后，进行调整和完善，然后才能逐渐推广。这些步骤都是科研评估必经的科学之路。在此过程中，应当特别

注意前面所提到的第二个原则，也就是科研评估的复杂性。考虑到我国科研、高教国情的复杂多元、参差不齐和超级体量，即便到了广泛推行的阶段，仍然不能一刀切，必须注意科学的限度与界度。这些就构成了科研评估不得不尊重的第五个原则——科学性。

令人乐观的是，教育界、科技界甚至公众都已清醒认识到科研评估的边限，不再迷信 SCI 论文的相关指标。正如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就《意见》答记者问时所说，SCI 论文指标体系并非评价系统，不能对应于创新水平和实质贡献，也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创新贡献，更不能把 SCI 论文简单等同于高水平论文；高引论文可能反映的是学术研究热点，但并不说明论文的创新贡献价值，也不适用对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工作的评价；论文主要是基础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SCI 论文相关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创新贡献。这些都具有正本清源的积极意义。

二、后 SCI 时代如何改进科研评估

对于后 SCI 时代的科研乃至大学评估，除了进行评估原则、限度的思考之外，还可以有什么改进方案呢？笔者多次受邀参加各大学的科研、教学或职称评估，曾先后在华东师大、香港大学、东京大学、马里兰大学、多伦多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现在的西安大略大学工作或学习。这些大学都符合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标准和范畴，分别属于下述五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国内地、日本、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结合在这些大学的切身体验，笔者就科研评估提出以下四点改进建议，抛砖引玉。

第一，不忘初心是科研评估体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在新管理主义盛行的时代，决策者和评估者常犯的一个共同错误，是把评估体系当作纯粹的管理工具，评估对象被野蛮地简单物化。后果当然是适得其反：被评估者或机构感到缺少应有的尊重，会产生应付评估、甚至弄虚作假

的反效果。这种反效果对科研产出的负面影响不难想象。事实上，近些年来屡禁不止的数据造假、论文抄袭、友情引用、学术泡沫等等令人痛心的堕落现象，都是与初心渐行渐远的恶果之一。

中国内地、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的大学都非常强调科研业绩，并与职称晋升、院校排名紧密挂钩，在科研评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工作狂”“教授累如狗”是真实的写照，单身、无子、家庭或社区责任漠然、甚至变态，都是见怪不怪。美国情形稍好，但薪水通常只支九个半月，暑假一到教授们就被逼满世界找工作，非常影响工作状态。相较而言，教育和科研工作最令人舒畅的是加拿大的大学。笔者跟同事或上级谈及SCI论文或大学排名，大家常常不知我所言何物。这大概与加拿大是一个“享受型”的国家文化有关。作为一名学者，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大脑是用来自由思考问题的，而非用来接受科研评估。因此，科研和教学反而有身心和工作环境的最好保障。

第二，牧羊式的代表作制度是相对合理的科研评估模式。自八十年代以来，笔者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的校园生活。四十年来的切身经历证明：学者可能在某个时期会出一些好的成果，但是不可能一辈子都出好成果——这是符合人的基本自然规律的。科研评估应该尊重和利用好这一自然规律，而代表作制度就是尊重这一自然规律的很好体现，有利于培育放养式、宽松良好的科研制度环境。这是为什么在科研评估体系中，代表作是被各国大学采用最广泛的一个基本制度。同样道理，代表作制度也适用于院校的科研评估，有利于把科研发展的自主权还给各大学。这样的院校赋权还能有益于促进高校的制度改革。

第三，与代表作制度相关的是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是科研评估最为常见的制度之一，国内个别高校也有试行，但却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个

中缘由，不言而喻。但是，也并非没有可替代的办法。其中，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共享技术和大数据平台，根据不同的学科领域，建立期刊论文（及其他学术成果）的国家专业评审人数据库，为学术成果评审搭建基于网络、开放式的国家管理平台，积极利用海外华人学者的科研资源，进一步强化盲审的透明制度建设，设立编辑和作者的问责机制，杜绝利益输送、裙带关系、人情发表等学术腐败现象，真正体现质量是期刊和出版社发表的唯一标准，让学术在阳光下健康地运行。

第四，制定激励科研成果国内优先发表的国家战略。在采用代表作制度的时候，如何取舍服务本土和面向世界之间的张力十分关键。科学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但科技的应用却是有疆界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科研工作必须有巨量人力和经费的投入成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知识产权进行更为强力的保护和本土强化——包括采取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措施，就是最为直接的证明。

转变科研评估的观念，有利于制定激励科研成果国内优先发表的国家战略。其实施，可以帮助中国收回科研成本和知识产权，真正服务于本土的社会发展，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增强全球科技界、教育界、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重视与行动。

与此同时，应该大力推动中文学术期刊的数量扩张、质量整顿与提升，提倡编辑工作专业化的出版模式，加强对学术期刊的制度监管。同时，创办和充实更多、具有本土知识产权的英文期刊，积极引领英文期刊的国际话语权。

三、以评促建、评建共赢才是改进的成功

“SCI至上”现象，背离了当年它曾给中国大学带来的积极作用，早该被扫入历史。《意见》的颁布与实施，终于开启了“后SCI时代”，

应该说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依笔者拙见,《新规》的步子甚至还可以再大一些,把大学排名乱象一并规范,同样在制度上进行治理。比如,不允许公立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大学)为国外排名公司提供院校数据,也不允许购买这些排名公司的相关数据,严禁各校官网、招聘、招生等传媒材料上引用或标识大学排行榜的名次,斩断经济输血,从而根除它们对科研评估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何处发表、用什么语言发表、发表之后是否被关注、如何受到关注等等,与知识创新的科学价值本无关系,不应该被曲解成科研评估的标准。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在名不见经传刊物发表的科学新知无以计数,发表之后沉寂多年然后再受热捧的科学新知也并不稀少。这些都不应该影响知识创新固有的科学价值,更不应该成为科研评估的金科玉律。

这也启示我们,科研评估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应有的目的在于以评促建、评建相长,以此促动知识创新和转移,服务于人类生活的终极福祉。正如教育改进科学学者、卡耐基教学基金会主席安东尼·布拉克所指出的那样:现有的改进问题都是系统自身造成的。成功的评估,常常不仅取决于评估体系自身的好坏,还在于能否调动评估对象的热忱和投入,赢得广泛的认可与支持,以达到系统改进的根本目的。因此,反思科研评价的五大原则,以及后SCI时代科研评估的四大改进举措,杜绝暴力式、整齐划一、失去文化内涵的评估方式,倡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精神与文化,才能真正达到中国科研评估的终极目的。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3月3日 作者:李军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系主任、全球教育合作中心主任、国际高等教育政策与领导学终身教授)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